

政治学经验研究和分析性研究 中价值中立的可能性

沈 友 军

(北京师范大学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5)

[作者简介] 沈友军(1969-), 男, 湖南澧县人,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法学博士, 主要从事政治学的知识论研究。

[摘 要] 政治学研究可以划分为发现和验证两个过程。发现阶段无法做到价值中立, 但验证阶段能够实现。政治科学家如果在研究中遵循逻辑一致性和经验可证性两个标准, 那就能获得可验证的、具有交互主观性的或客观的知识, 就做到了方法论上的价值中立。因为, 所有政治学者都拥有同样的一套演绎逻辑, 所以逻辑检验过程能够排除不同价值的干扰; 价值虽然能干扰经验观察, 但是, 如果提高命题的操作化程度, 增强观察的直观性, 价值观不同的政治科学家也能在经验检验过程中得出同样的观察结论。不能因为发现阶段无法做到价值中立就完全否定经验研究和分析性研究中价值中立的可能性。

[关键词] 政治学; 经验研究; 分析性研究; 价值中立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6)02-0197-07

本文讨论的问题是: 在政治学的经验研究和分析性研究中, 保持“价值中立”的可能性是否存在? 至于规范性研究, 所有政治学者都认为它不可能也不必要价值中立, 本文的讨论范围不包含规范性研究。

要理解上述三种不同类型的研究, 即经验性、分析性、规范性研究是如何划分出来的, 可以从政治学命题的类型划分入手。政治学的命题或知识有如下 3 种不同类型^[1] (第 4-13 页)^[2] (第 31 页): (1) 经验的命题, 也即“是”的命题, 涉及到经验世界的证据或以经验世界的证据为基础。(2) 分析命题。按照康德的观点, 分析判断是这样的判断: 其谓词 B 属于主词 A, B 是(隐蔽地)包含在 A 这个概念中的东西, 如“一切物体都有广延”。谓词并未给主词概念增加任何东西, 而只是通过分析把主词概念分解为它的分概念。分析命题基于前提进行逻辑推论, 在特定的逻辑体系内必然为真, 可以说, 分析命题是由于定义而成为真的。(3) 规范性命题, 也即“应该”或“好坏”的命题, 它陈述的不是事实, 而是个人的欲望、偏爱、好恶以及理想, 即价值判断。“‘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3] (第 106 页), 即价值形成源自于主体需要, 价值形成的条件是客体具有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 价值形成的实质是主客体之间需要与满足关系的不断生成; 价值判断主要反映的是主体对于对象价值属性的断定和判别。根据所论证的命题, 政治学研究也可以相应地分为 3 类: 经验研究、分析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本文只回答在政治学的经验性和分析性研究中“能否”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价值中立”的问题。

1980 年, 我国台湾政治学者郭秋永发表了论文《经验研究中免除价值判断的问题》^① (以下简称郭文), 该文在做了详尽的英文文献述评之后, 提出了“方法论上的价值中立”(methodological value-neutrality)概念, 认为在政治学的经验研究中免除价值判断是可能的。郭文借鉴科学哲学的成果, 认为

政治科学研究可以分为两个系统,即发现系统(context of discovery)和验证系统(context of justification);在验证系统,如果遵循逻辑一致性和经验可证性两个标准,就能够排除价值判断对验证过程的影响,也就是说能够做到价值中立。作者没有进一步详细地、深入地说明和论证:为什么遵循这两个标准就能够做到价值中立?按照这两个标准进行理论检验的过程中,到底是如何避免不同检验者的不同价值判断对验证工作及其结论的影响的?本文基本赞同郭文的论点。

郭文的概念与论点至今没有受到大陆政治学界关注。叶娟丽^[4](第 91 页)专门探讨过政治学研究能否做到价值中立问题,曾经引用过郭秋永的另一相关著作《政治科学中的价值问题:方法论上的分析》中的一段话,但没有介绍郭秋永的论文《经验研究中免除价值判断的问题》。她的结论是:政治学研究没有做到价值中立的可能性^[5](第 91-95 页)。王惠岩、俞可平等著名政治学家也都表达了同样的论点。

本文打算向大陆政治学界介绍郭文关于经验研究中价值中立的可能性的论点,以及本文为此论点提供的进一步的说明和论证。本文还顺便增加一个新论点及其简要论证:分析性的政治学研究中,更加能够做到价值中立。然后,本文将简要地介绍和评论一下大陆政治学界的相关论述。最后,简单地阐述一下价值中立的可能性论证的重要意义。

一、郭秋永论述价值中立的可能性

1. 重新界定“价值中立”和“客观性”与价值中立是否可能的争论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客观性”问题。有些学者将价值中立和客观性视作同义语,有些学者则强调两者的差异,郭文重新界定了价值中立和客观性两个概念,以澄清争论。

郭文把客观性界定为“交互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任何经验研究者,若遵循逻辑一致性与经验可证性这两个标准,而以可指明的程序来进行研究,则其研究具有客观性或交互主观性,其所获致的知识,则为客观的知识或交互主观间可传递的知识。在遵循这两个标准的情况下,任何其他的研究者,运用相同的程序于相同的问题上,将得到相同的结果。如此一来,原先属于“私有的”研究,就可以“公众化”,从而具有“交互主观性”。进一步说,在遵循这两个标准的情况下,由于其他的研究者能够掌握相互沟通中所用符号的意义,或能履行彼此沟通中所描述的程序,因此,获得这种知识的研究者,都可以将其传递给尚未具有这种知识的研究者。

郭文进而以相同的标准,把价值中立界定为“方法论上的价值中立”:任何研究者在从事经验研究时,若遵循逻辑一致性与经验可证性这两个标准,则其研究便属方法论上的价值中立。郭文选定这两个标准来界定价值中立,是因为在经验研究上,遵循这两个标准的任何研究业已产生了许多事实特征,例如获得了种种交互主观间可传递的知识。郭文没有详细说明“逻辑一致”和“经验可证”的含义。我们认为,郭文中的逻辑一致性要求是指,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过程符合演绎逻辑的规则,理论中不含有逻辑上的矛盾。经验可证性要求是指,政治科学研究的结论应当便于检验者通过观察经验事实,将被检验的理论陈述与经验事实相比照,从而判断被检验的理论的正确性。

人们也可能认为,郭文对方法论上的价值中立作如此界定,即只要满足逻辑一致性和经验可证性就是做到了方法论上的价值中立,这个界定本身也包含着郭秋永自己的倾向、爱好或价值判断。郭秋永本人也承认这种界定隐含着价值判断,但是郭秋永同时指出,一旦做了这种价值判断之后(即选定了这两个标准之后),关于任一经验研究是否符合这两个标准的判断,却属于一种事实判断。为了便于理解这一点,郭秋永举了法官适用法条来进行审判工作的例子。法条都是规范性语句,是包含丰富的价值判断的;适用法条判案的法官们也各持不同的价值判断。但是,关于某被告是否触犯某法条的判断却是一个关于事实的判断,一般说来,持有不同价值的法官们也可以得出相同的判断。当我们判别某种研究是否做到了方法论上的价值中立时,就是以类似于法官的身份作判断的。你我即使价值观相反,也能够就某一研究是否满足了方法论上的价值中立要求作出同样的判断。

2. 将政治科学研究划分为发现系统 and 验证系统。郭文借用了科学哲学对发现系统和验证系统的划分。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当研究者提出一个或一套陈述句或判断后,我们可以提出两种不同的问题:如何想起这种陈述句?支持这种陈述句的理由是什么?前一种问题是关于科学发现的问题,它关切研究者如何获得良好的陈述句,这个问题所论及的乃是“发现系统”。后一种问题则是验证的问题,它关切陈述句的保留或拒斥,这个问题所论及的乃是“验证系统”。

在发现系统中,研究者获得良好的陈述句,可能是来自上帝的启示、个人的价值判断、一般的价值判断、学界的价值判断、偶现的灵感、飞驰的想象力、他人的成败记录……甚至可能来自聆听音乐或静观日落等等。发现过程可能隐含着丰富的价值判断。

验证系统是对在“发现系统”中得到的陈述句的验证。验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验证过程中,必须遵循一定的方法。科学中的验证,就是检查科学陈述是否满足两个要求:逻辑一致性和经验可证性。科学家们认为,遵循这两个要求,可减少不同研究者所持有的不同价值对验证过程的影响,从而提高价值中立的可能性。在验证系统坚持上述两个标准,获得“客观”的知识,有助于排除发现系统中个别研究者的价值判断的污染。

郭文的论点是:在验证政治科学理论时,如果遵循逻辑一致性与经验可证性这两个标准,就能做到方法论上的价值中立,就可获得“客观的”或“交互主观间可传递的知识”。这个论点为什么能够成立呢?或者说,如何论证它呢?郭文没有对此给予进一步深入的说明和论证!郭秋永也许认为该论点已经是如此简单、不证自明的了。但是,我们认为,这个论点不是不证自明的、只需要显示出来就可以了的,相反,它正是郭文需要下力气予以说明和论证的。

二、方法论上价值中立的可能性论证

我们试图在下文中做郭秋永没有做的工作。论证可以分为两部分:(1)为什么遵循逻辑一致性要求,就有助于做到价值中立或排除价值对研究的影响?(2)为什么坚持经验可证性标准,就有助于做到价值中立?特别是后者,尤其需要进一步的说明和论证。另外,我们还将简要地论证,政治学的分析性研究更容易做到价值中立。

1. 为什么遵循逻辑一致性要求,就有助于做到价值中立或排除价值对研究的影响呢?

我们认为,这里的“逻辑”就是指演绎逻辑。演绎逻辑规则被人类发现或运用以后,全人类不同地点、不同时代和不同阶级的人都(可)拥有同一套演绎逻辑。价值观不同的人拥有相同的演绎逻辑规则,演绎逻辑不因持有人的价值不同而不同。因此,只要政治科学家都接受和运用演绎逻辑,那么,在检验一个政治科学理论成果的内在逻辑是否严谨时,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持有价值A的政治科学家认为被检验的理论成果是逻辑一致的,而持有相反价值——即非A——的政治科学家认为被检验的理论成果在逻辑上有矛盾。所以,当政治科学家们纯粹从事逻辑推导时,价值判断不会影响其推导过程。两个价值判断刚好相反的政治科学家,也能够从同一前提推导出同一结论^[6](第178页)。这就是说,在遵循逻辑一致性要求时,能够排除价值对推理的影响,即在逻辑推理过程中做到价值中立。

自然科学史上有一个运用逻辑推理进行理论检验的例子。伽利略仅仅通过指出亚里士多德的“落体运动法则”的逻辑矛盾就能将该法则推翻。亚里士多德认为,落体的速度与重量成正比。一个重10千克的物体的下落速度一定是一个重1千克的物体的10倍。伽利略认为这不合逻辑。他设想,假如把一个重10千克的铁球和一个重1千克的铁球拴在一起,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法则,就会得出相互矛盾的结果:如果把它们当做两个物体,则下落得慢的小球一定会拖住下落得快的大球,使它们下落的速度小于10千克铁球的下落速度;如果把它们当做一个物体,则总重量达11千克,它们下落的速度应该大于10千克铁球的下落速度。亚里士多德的法则无法通过逻辑一致性检验。所有科学家,不论他如何热爱和支持亚里士多德学说,不论其价值观如何,都不得不接受伽利略的逻辑批驳。这说明在逻辑推理过程

中能够排除价值“污染”。

2. 为什么坚持经验可证性标准, 就有助于做到价值中立呢?

我们推测, 郭秋永大概认为, 即使是价值判断不同的两个政治学者, 在观察“同一个”经验事实时, 观察结果和结论也会相同; 即人们在从事经验观察和经验检验工作时, 其观察结果不会受到价值判断的干扰。也就是说, 经验观察或检验过程是“价值中立”的。既然如此, 如果政治科学研究坚持经验可证性要求的话, 那么就能够在验证系络中做到价值中立, 或者说排除价值判断的干扰。

问题的要害是, 价值判断是否真的不会影响经验观察呢? 我们的回答要比郭秋永更加谨慎一些。我们认为, 会有一定影响的。郭秋永可能没有注意有关“观察渗透理论”之类的科学哲学理论, 从而没有考虑到经验观察过程中可能或多或少地渗透着理论, 甚至也渗透着价值判断。

科学哲学家汉森为了说明“观察渗透着理论”这一道理^[7](第 22 页), 就做了这样一个假设或思想实验: 在黎明时分, 天文学家第谷和他的学生兼助手开普勒站在一座小山上朝东看, 两人都看见在绿色和蓝色斑点之间一个橘红色圆盘。在某种意义上, 两人看见的是同样的东西。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 第谷和开普勒看见的不是同样的东西。第谷看见太阳从固定的地平线上升起, 而开普勒看见在静止的太阳底下滚动的地平线。第谷和开普勒持有不同的天文学理论, 它们影响到两人对同一现象的观察结果。汉森想用这个假想的看日出的例子来说明, 观察者所持有的理论会影响经验观察, 没有中立的或纯粹客观的观察, 观察会受到观察者头脑中已有的理论的“污染”。

科学中的理论又是由范式所规定的。范式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6](第 157 页)。这种信念犹如宗教的信念, 使科学家产生“虔诚的狂热”, 想把其认识对象强迫纳入范式所规定的思想框框里去。依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看来, 当各种范式并立竞争时, 争论各方都企图转变对方的见解, 但是各方都不能通过证明来解决争论。这主要是因为各种范式之间的不可比较性。支持不同的范式的科学家们即使在相同的时空来考察相同的现象, 仍然可能“看见”不同的事物或不同的事物关系。一方面, 各式各样的实验, 都只依据特定的范式才能进行; 不同范式的科学家们所使用的评价程序也服从各自的范式。另一方面, 所争执的正是每一范式本身。因此, 科学界并不运用实验或各种范式下的科学评价程序来决定范式的接受与否。作出这种选择, 只能基于信念^[6](第 142 页)。范式的接受就是一种价值判断, 不同范式间的转换就是不同价值判断之间的转换。

郭文也指出过, 认为政治学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的政治学家们就是依据库恩的这种观点, 通过把行为主义政治学看成一个范式, 从而认定行为主义的整套宗旨便是一套价值判断。许多政治学者引用库恩的范式理论, 具体地指出: 真实世界的假定、政治研究目的的认定、重要问题的提出、研究方法的选用以及概念架构的选择等 5 个过程都隐含着价值判断, 因而否定了政治学研究价值中立的可能性。我们还要增加一点的是, 不仅这 5 个过程中隐含着价值判断, 而且, 政治科学研究结果的经验检验过程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隐含着价值判断。因为, 在某种程度上, 经验观察渗透着理论、范式或信仰。

但是, 政治科学家们也不是对此束手无策, 相反, 经验观察与检验过程中的价值渗透能够在较高程度上得到控制。政治科学家们可以通过提高被检验命题或理论的“操作化”程度, 以便我们能够尽量排除价值对经验检验过程的影响, 价值中立地验证供检验的命题或推论。我们认为, 检验过程本身应当强调直观性。直观性越强, 观察就越能做到客观或价值中立。就拿第谷与开普勒看日出的例子来说, 直观性强的许多方面, 例如, 太阳与地平线的距离是不是越来越远了? 太阳的颜色是不是越来越淡了? 它们都不难被“看”出来, 而且第谷和开普勒“看”的结论应当相同, 他们所持有的不同的天文学理论、信仰或价值不会影响他们对如此直观的问题的判断。至于是太阳绕地球转(地心说)还是地球绕太阳转(日心说)的问题, 甚至还有地球是否自转的问题, 我们认为, 如果第谷和开普勒站在地球与太阳之外(或太阳系之外)的第 3 个星球上进行观察, 并且天文望远镜足够的好, 那么也就一目了然了, 直观性很强了。即使他们这样观测之前持有相反的天文学理论、范式或信仰, 也还是能够“看”出同一真相: 地球绕着太阳转, 同时地球还自转。但是站在地球上, 看地球和太阳谁绕着谁转, 就很不直观了, 更不可能“看”出地球

的自转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所要观察的事物越是直观和明确,经验观察就越是能够排除价值影响。本文认为,经验观察渗透着价值的命题也不能被夸大。

政治科学可以借鉴社会学研究方法,通过“操作化”来增强研究过程与结论的直观性,以便降低价值判断对经验观察与检验的影响。操作化就是把我们无法得到的有关社会结构、制度或过程,以及有关人们行为、思想和特征的内在事实,用代表它们的外在事实来替换,以便于通过后者来研究前者。或者说,操作化就是将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观察的具体指标的过程^[8](第102页)。它是对那些抽象层次较高的概念进行具体测量所采用的程序、步骤、方法、手段的详细说明,比如将概念“同情心”转化为“主动帮助盲人过街”、“主动给讨钱者钱物”、“主动向灾区捐款”。再如,将学生的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课程的成绩按3、2、1的权重分别加权,然后相加计算出平均值,这是对抽象概念“智力水平”进行操作化。操作化程度高的测量过程及其结果能够做到价值中立,例如,即使两个测量者价值观相反,对于某人“主动向灾区捐款”的次数和金额、某学生3门课程成绩加权后的平均值的数字,两人也能够得到同样的判断。所以,我们认为:通过对概念或变量进行操作化处理,政治科学家们可以在经验验证过程中做到价值中立。

以上所谈的是政治学经验研究中价值中立的可能性,未涉及分析性研究。经验研究要做到方法论上的价值中立,必须同时符合两个条件,即具有逻辑一致性与经验可证性。但分析性研究本来就是不需要进行经验检验的,只需检验其推理是否有逻辑上的矛盾。对于这种分析性研究,只需坚持“逻辑一致性”标准即可做到“方法论上的价值中立”。由于价值判断“污染”逻辑比“污染”经验观察更难,所以,纯粹分析性研究比经验研究更容易做到价值中立。

郭文在界定方法论上的价值中立时,已将其范围局限在经验研究,没有涉及分析性研究。我们在此重新界定方法论上的价值中立:任何研究者在从事分析性研究时,若遵循逻辑一致性这一标准,而在从事经验研究时,若遵循逻辑一致性与经验可证性这两个标准,则其研究便属方法论上的价值中立。

三、大陆学者的相关研究述评

大陆做了相关研究的学者都认为,政治学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

在王惠岩主编的《政治学概论》与《政治学原理》两本教材的相关章节中,撰稿人韩冬雪都这样写道:自然科学对它的研究对象是不加任何价值评价的,但社会科学的研究却必须以某种价值判断为前提。不同阶级和个人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于是人们在看待和研究社会现象时,就不可能离开其自身的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任何社会科学都不可能回避的基本前提。行为主义政治学者宣称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结论是纯客观的,是没有任何价值色彩的,这只能是“掩耳盗铃”的真实谎言。面对具有是非价值标准的政治现象而采取所谓的价值中立态度,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9](第25页)^[10](第16页)。

本文认为,“自然科学对它的研究对象是不加任何价值评价的”这句话是错误的,库恩的范式理论本来就是针对自然科学研究的,今天全球的科学哲学家们都承认,价值判断不仅是社会科学的基本前提,而且也是自然科学的基本前提。其实,一切科学研究在其发现系统都隐含价值判断,自然科学的价值中立也只在验证系统是可能的。

俞可平在其主编的《政治学通论》中写道:包括政治行为主义者在内的许多西方政治学家认识到,政治学研究要真正做到“价值中立”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对事实的观察、对经验的分析、对数据材料的整理加工都难免受到研究者价值观的影响^[11](第9页)。用本文的观点来看,这里说的其实只是,政治科学研究的发现系统是做不到价值中立的。本文当然同意这一判断,但是,不能由此得出政治学研究就完全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了,因为在政治科学研究的验证系统、在政治学的分析性研究的逻辑过程中,都是有可能做到价值中立的。俞可平另外著有一本《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批评西方的新政治分析“标榜什么‘价值中立’”^[12](第216页)。但作者都没有做进一步的论证了。

叶娟丽较深入地研究了政治学研究能否价值中立的问题,其答案也是政治学研究不可能也不应该

价值中立^[5](第 91-95 页)。因为政治学是一门特殊的科学,政治现象与价值密切相关。不下价值判断,就无法研究政治现象,因而政治学不能够也不应该价值中立。叶所谈的是“政治学研究”,包含经验研究、分析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本文所谈的只是前两种政治学研究。

首先,叶指出,政治学研究主体无法做到价值中立,政治学研究者是无法摆脱价值束缚的。这一点我们也是同意的。但是,研究者总是抱有某种价值的,不等于其经验研究和分析性研究也一定只反映其个人的价值偏见。其价值自然会对其研究的发现系统产生影响,例如,“不可能存在不加选择的事实;而事实一旦需要选择,就不可避免地会受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哲学的影响。”^[13](第 629-635 页)但研究者的价值观不一定非要影响其论述的基本逻辑,使其违背形式逻辑;假如他或她努力提高研究的操作化程度,增强其检验命题的直观性,那么,其价值观也不一定使得相关的命题检验工作受到价值观的“污染”。

其次,叶认为,政治学的研究客体必须包括政治价值等规范问题,政治学本身就是一门以政治利益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没有价值,就没有政治学^[14](第 49-52 页)。所以,政治学不能做到价值中立。这里的意思是说,政治学的规范性研究是无法做到价值中立,我们同意这一观点,我们的主张不过是,除了规范性研究,政治学的其他两类研究,即经验研究和分析性研究,是能够做到方法论上的价值中立的。

最后,叶指出,政治学的研究结果必须涉及价值判断及价值选择,这也是政治学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的原因。我们认为,如果所谈的是规范性研究,那么我们完全赞同。如果说到经验研究和分析性研究,其研究结果是如何“涉及”价值判断及价值选择的呢?我们还不清楚。经验研究的结果是这样的事实判断:如果变量 A,则有变量 B($A \rightarrow B$)。仅仅是这一判断是不必受到价值判断的污染的。分析性研究的结果是:如果前提或定义为 A,则可以推导出结论 B。这里,推导过程中的逻辑是不受价值污染的。

叶列举了历史上大量的政治学研究没有做到价值中立的例子,归纳出结论:历史上的政治学研究都没有做到价值中立。叶由此推出:政治学研究确实是无法做到价值中立的。我们不同意这一推理逻辑。我们认为,历史上大量的政治学研究都没有做到,这不等于就不能做到。有些人根本就不想做到,其研究当然做不到;有些政治学者想做价值中立的或客观的研究,但是在其发现系统,当然也一定是隐含着价值判断的,我们不否认这一点。我们只是主张想做价值中立的政治学经验研究和分析性研究的学者,如果坚持逻辑一致性和经验可证性标准,他是可以做到本文所介绍的“方法论上的价值中立”的。

总结以上相关研究,大陆学者们一致坚持的主要观点,是政治学的经验研究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的。依据主要有两点:第一,政治学研究者总是持有某种价值立场的;第二,研究者自身的价值立场会影响到问题的选择、事实的观察、对经验的分析、对数据材料的整理加工等,从而影响其研究发现。本文同意这两点依据,但是,我们认为,这只能说明,经验研究的发现阶段至少隐含着研究者的价值判断,有的情况更严重,即研究者的价值判断甚至使研究结论发生歪曲。我们的观点是,虽然发现阶段会受到价值判断的影响,但是,在验证阶段,可以做到价值中立;而这一点是大陆相关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

四、价值中立的可能性论证的意义

本文论证经验性和分析性政治学研究能够在验证系统做到价值中立,具有 3 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支持政治学的科学化。一门学科的研究越是充斥着研究者各自不同的价值偏见,这门学科的科学性就越弱;反之亦反。而政治学科学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假如政治学研究毫无价值中立的可能性,政治学家都只是宣传自己的个人价值,那么,价值不同的人之间又怎么解决其认识上和价值观上的分歧呢?认识领域的(注意,不是说评价或价值领域的)共识判断还有没有可能达成呢?集体的共同行动还有没有认识基础呢?如果任何关于经验世界的因果联系的认识都不可能取得共识,那么除了用暴力解决认识分歧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开展集体的共同行动呢?二是由此缩小意识形态的作用空间,为政治科学真理留一些空间。三是为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部分翻案。许多人批评说,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追求的价值中立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是不可能有什么前途的,这一追求是错误的……这些批评需要部分翻

案。当然,有的行为主义者认为政治科学在发现系统也能够做到价值中立,那仍然是不合适的。

注 释:

① 该文载于郭秋永:《政治学方法论研究专辑》,(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初版。

[参 考 文 献]

- [1] [美] 艾伦·C. 艾萨克. 政治学: 范围与方法[M]. 郑永年, 等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 [2] 张 铭, 严 强. 政治学方法论[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0.
- [3]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5.
- [4] 叶娟丽. 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及其限度分析[D]. 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2.
- [5] 叶娟丽. 论政治学研究的不可“价值中立”——以行为主义政治学为例[J]. 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 2004, (9).
- [6] [美] 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 金吾伦, 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7] 汉 森. 发现的模式[M]. 邢新力译.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8.
- [8] 风笑天. 社会学研究方法[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 [9] 王惠岩. 政治学概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 [10] 王惠岩, 韩冬雪. 政治学原理[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 [11] 俞可平. 政治学通论[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
- [12] 俞可平. 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9.
- [13] 叶娟丽. 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悖论[J]. 武汉大学学报, 2004, (5).
- [14] 叶娟丽. 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之再检讨[J]. 中州学刊, 2001, (5).
- [15] 俞可平. 试从政治行为主义的得失谈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方向[J]. 政治学研究, 1986, (3).

(责任编辑 叶娟丽)

Possibility of Value-neutrality in Empirical or Analytical Political Studies

SHEN Youju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Biography: SHEN Youjun (1969-), male, Doctor, Lecturer,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political science.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stud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context of discovery and context of justification. Value-neutrality is impossible in the context of discovery, but it is possible in the latter. If political scientists keep to deductive logic and make their studies verifiable empirically, they can get intersubjectively transmissible knowledge. We can say that they have kept methodological value-neutrality in their studies. The reas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all scholars use the same deductive logic; second, the political scientists who hold different values can get the same conclusion in the process of empirical verification, if they make their propositions operational and intuitionistic. We can't entirely deny the possibility of value-neutrality in empirical or analytical political studies by reason of the impossibility of value-neutrality in the context of discovery.

Key words: political science; empirical studies; analytical studies; value-neutrality